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出版书目 甲种 第八号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出版资助项目

三峡地区历史时期 考古发现与研究

向渠奎 /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三峡地区历史时期 考古发现与研究

向渠奎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峡地区历史时期考古发现与研究 / 向渠奎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229-10149-7

I. ①三… II. ①向… III. ①三峡—考古发现—研究 IV. ①K87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7160号

三峡地区历史时期考古发现与研究

SANXIA DIQU LISHI SHIQI KAOGU FAXIAN YU YANJIU

向渠奎 著

责任编辑: 吴芝宇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吴庆渝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川外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6.5 字数: 370千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0149-7

定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三峡地区历史时期概述 /1

第二节 三峡地区历史时期考古回顾 /4

一、1949年以前 /4

二、1949年至1990年 /5

三、1990年至今 /6

第二章 城镇遗址之发现与研究

第一节 汉晋六朝时期城镇遗址 /8

一、云阳旧县坪“胸忍”县城遗址 /9

二、巫山古城遗址 /15

三、巴东旧县坪汉晋六朝城址 /17

四、汉晋六朝时期城镇的特征 /19

第二节 隋唐五代时期城镇遗址 /20

一、云阳明月坝集镇遗址 /21

二、巴东旧县坪隋唐五代城址 /26

三、隋唐五代时期城镇的特征 /30

第三节 宋元明时期城镇遗址 /30

一、巴东旧县坪宋代城址 /31

二、巫山大昌古城遗址 /36

三、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 /40

- 四、合川钓鱼城遗址 /42
- 五、奉节白帝城遗址 /45
- 六、宋元明时期城镇的特征 /46

第三章 墓葬遗存之发现与研究

第一节 秦汉墓葬 /48

- 一、典型墓地 /48
- 二、墓葬类型 /54
- 三、随葬品 /70
- 四、墓葬年代与分期 /70
- 五、文化因素分析 /74
- 六、墓葬分区 /76

第二节 六朝墓葬 /78

- 一、典型墓地 /78
- 二、墓葬类型 /80
- 三、随葬品 /91
- 四、墓葬年代与分期 /91
- 五、葬制葬俗 /93

第三节 唐五代墓葬 /97

- 一、典型墓地 /97
- 二、墓葬类型 /98
- 三、随葬品 /106

第四节 宋代墓葬 /107

- 一、典型墓地 /108
- 二、墓葬类型 /109
- 三、随葬品 /119
- 四、墓葬年代与分期 /120
- 五、墓葬分布及其原因 /121
- 六、漏泽园 /122

第五节 明代墓葬 /123

一、典型墓地 /123

二、墓葬类型 /125

三、随葬品 /129

四、年代与分期 /130

第四章 宗教遗存之发现与研究

第一节 佛教遗存 /132

一、佛教寺庙遗迹 /132

二、佛教石窟寺摩崖造像 /135

三、墓葬材料中的佛教遗物 /139

四、生活居址中出土的佛教遗物 /143

五、三峡地区佛教遗存的特点 /147

第二节 道教遗存 /148

一、道教宫观 /148

二、墓葬材料中的道教遗存 /149

三、三峡地区道教遗存的特点 /157

第三节 其 他 /157

第五章 盐业遗存之发现与研究

一、重要制盐遗存 /161

二、三峡地区制盐业的特点 /170

第六章 冶金遗存之发现与研究

一、冶 铜 /172

二、冶 铁 /173

三、冶 锌 /174

第七章 重要遗物之发现与研究

第一节 农 具 /178

一、秦代农具 /178

二、两汉六朝时期农具 /180

三、唐宋时期农具 /186

四、明清时期农具 /189

第二节 陶瓷器 /189

一、秦汉时期陶瓷器 /189

二、六朝时期陶瓷器 /199

三、唐宋时期陶瓷器 /207

四、明代陶瓷器 /215

第三节 漆木器 /219

一、漆棺槨 /219

二、随葬漆器 /220

第四节 铜 镜 /223

一、汉至六朝铜镜 /223

二、唐五代铜镜 /230

三、宋元明铜镜 /232

第五节 其他重要遗物 /233

一、铜 器 /233

二、玻璃器 /235

三、算 珠 /238

四、棋 子 /238

五、骰 子 /239

六、骨 牌 /240

七、珍 珠 /240

八、琥 珀 /241

参考文献 /243

第一章 导 论

人们通常所谓之“三峡地区”并不是一个完整、准确的行政区划,历史上的各代王朝也并没有将“三峡地区”作为一个行政区划来命名。它的区域地形、气候、土壤、植被和水文特征更符合一个独立地理单元的标准。今天,人们统称的三峡地区从行政区划上看,则指西起重庆,东到湖北宜昌,北靠大巴山脉,南临川鄂山地,涵盖重庆忠县、垫江、万州、梁平、云阳、开县、奉节、巫山、巫溪,湖北巴东、秭归、建始、长阳、兴山、宜昌等广大地区,土地面积约1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400万。

第一节 三峡地区历史时期概述

历史上的三峡地区,由于交通闭塞,经济发展相较于中原地区来说相对滞后。但是,三峡地区作为连接四川盆地与江汉平原的交通要道,加之盛产井盐,盐业是历代王朝财税来源之一、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公元前316年,秦派大军灭巴蜀,置巴郡、蜀郡起,中央政府便开始在此地设立地方行政机构,加以控制。

西汉时期,沿袭秦朝的郡县制,三峡地区分属益州巴郡和荆州南郡。王莽时期,部分治所名称有所改动,但行政区划仍与前期无异。西汉末东汉初,公孙述割据巴蜀,江关(今奉节县)以西为其所有,夷陵一带为田戎所据。经过一系列战争,建武十二年(36年),三峡地区尽入东汉版图,其政区建置沿袭西汉。东汉末年(194年)益州牧刘璋将巴郡一分为三:分别为巴郡、永宁郡、固陵郡,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将南郡也一分为三:分别是南郡、襄阳郡、临江郡。赤壁之战后,江陵郡归孙吴,后归刘备,改名为宜都郡。

三国时期,三峡地区分属于吴、蜀两国。在蜀为益州之巴东、涪陵、巴郡,在吴为荆州之宜都、建平郡。公元263年,蜀国灭亡,巴东、涪陵、巴郡归属于魏。两年后,又属西晋。公元280年,宜都郡、建平郡入西晋版图。

西晋末东晋初,巴郡、巴东、涪陵先后属成汉政权之荆州,巫山以东为东晋属地。公元347年,桓温灭成汉,巴郡、巴东、涪陵地入东晋。三峡地区分属益州巴郡、涪陵郡和荆州的巴东、建平、宜都三郡。其间,巴东郡以西曾被前秦和譙纵占据。南朝宋、齐、梁时期,三

峡地区分属益州巴郡、涪陵郡和荆州巴东郡、建平郡、宜都郡。

西魏废帝三年(554年),三峡地区归入西魏版图,分属于巴州的巴郡、东阳郡、涪陵郡,临州的临江、安乡郡,开州的开江郡,容州的容山郡,信州的巴东、建平、信陵郡,拓州的宜都郡。北周时期,郡名略有改动,而南朝陈朝曾占有三峡地区的东端,置信州。

隋朝开皇三年(583年),废郡存州,实行州县二级制。大业三年(607年),省并部分州县,改州为郡,为郡县二级制。这一时期,三峡地区由分属渝、临、容、开、南、信、峡、荆等州逐步变为分属巴郡、巴东、通川、宕渠、夷陵、南郡。隋末义宁二年(618年)又分别在巴东郡的临江县置临州、盛山县置万州。

唐开元以后地方行政演变为道、州(郡)、县三级制。武德元年(618年),改郡为州,天宝元年(742年)改州为郡,乾元元年(758年)复改郡为州。贞观元年(627年),分全国为十道,初为地理区域,后为监察区。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再分全国为十五道,道由监察区向政区转变。安史之乱后,道成为州之上的一级行政实体。至德二年(757年),剑南道分成东、西二川节度使。今三峡地区则分属剑南东川、山南西道、荆南道和黔中道。五代十国时期,地方政区制度基本沿袭唐制,三峡地区归州以东属南平(荆南),夔州以西先后属前蜀、后唐、后蜀。

宋代地方政制是路、府(州、军、监)、县三级制。三峡地区属于夔州路东北部和荆湖北路归州和峡州。夔州路部分又置夔州、忠州、万州、开州、涪州、渝州、云安军、梁山军、南平军、大宁监进行管理。元代时,三峡地区分属四川、湖广、河南三个行省。元末农民起义中,至正十七年(1357年),明玉珍率领一支义军西征。二十一年(1361年),称蜀王。次年,称帝,建大夏国。势力极盛之时,三峡地区几乎尽归其有。

明朝地方政制基本上是省、府(州)、县三级制。三峡地区分属四川布政司的重庆府、夔州府、石砭宣慰司和湖广布政司的荆州府。而清朝又在省与府(直隶州、厅)之间增设道,形成了省、道、府、县的四级政区制度。三峡地区则分属于四川省内的川东道;湖北省内的荆宜施道,川东道下又置重庆府、夔州府、忠州直隶州、石砭直隶厅;荆宜施道下又置宜昌府。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的统治被推翻,经历短暂的南北分治,中国进入北洋政府时期。中华民国沿袭了清朝的疆域,并进行了省级政区调整以及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此时的三峡地区分属于四川省的东部以及湖北省的西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地方政区也有调整,但三峡区域的归属基本与前期相同。

新中国成立以来,地方政区的演变大致历经了4个阶段,三峡地区的归属也经历了一些变化,1949年至1954年6月前,全国先后建立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大行政区,大行政区是在省级政区之上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三峡地区归属于中南行政区的湖北省以及西南行政区的川东行署区和重庆市。1952年,行署区被撤销,重新设立了江苏、安徽、四川三省,三峡地区再次归属于西南行政区下的四川省东部和中南行政区下

的湖北省西部。1954年6月至1966年5月,开始撤销大行政区,并进行省级政区调整,三峡地区与前期一样分属于四川省和湖北省,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至1997年3月14日,重庆直辖市设立,下辖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三峡地区开始分属于重庆直辖市与湖北省的西部地区并延续至今^①。三峡地区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立,带动了区域内城镇的兴起,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本地与外界的商业贸易、文化的交流互动。

三峡地区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区域,具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自石器时代以来,本地就形成了浓郁的地域特色文化。秦汉时期,中原北方文化逐渐与本地的传统融合,尽管被纳入了秦汉的大一统,但是封闭性的地域特征还是延续了本地文化固执的一面,例如三峡地区考古发现的陶屋模型,一方面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但干栏建筑、带有檐廊房屋模型的流行,则体现了这一地区陶屋模型的地域特色^②。六朝到宋元明清时期,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也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从遗址、墓葬甚至许多出土器物本身都屡见不鲜,使我们能见微知著,在不断变化的历史中找寻到某个历史瞬间以及文化嬗变过程中不变的内核。

三峡地区作为连接中原与西南地区重要的移民迁徙和物资运输通道,从形成开始就承载着各个历史时期、各地区人类文化传播互动的重任。通过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古代移民的踪迹、商品的流通情况得以直观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我们看到了汉代的市镇、北方移民的土洞墓、长江下游的瓷器,文化传播和区域互动正是因为考古而不再抽象,它的真实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一点不仅仅是三峡地区于我国历史考古学的重要贡献,也是考古本身的价值所在。

三峡地区历史时期考古亦是中国考古学重要组成部分。也正因为如此,三峡地区历史时期考古也具有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许多特性以及社会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价值。此外,从现代人文主义构建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看,三峡考古的重要性不可估量。三峡地区有数十处可说明秦文化进入三峡地区历史过程的遗址和墓地;470余处汉朝至六朝的遗址和墓地;有数十处古代枯水题刻和宋代以来洪水题刻组成的举世罕见的古代石刻水文记录长廊;有东汉石阙和数百处唐以后的摩崖造像、碑碣、摩崖诗文题刻,许多都是著称于世的珍贵艺术品;三峡地区还有近300多处结合三峡自然环境特点的明清建筑物以及大量土家族等民族的民俗文物。三峡库区已经被滚滚长江淹没,但是所有的人类文化遗产不能因此被淹没,而三峡考古便是这些文化得以保存和传承的重要前提。

① 刘君德、靳润成、周克瑜:《中国政区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25—129页。

② 武玮:《峡江地区汉晋墓葬出土陶屋模型探析》,《四川文物》2010年第6期。

第二节 三峡地区历史时期考古回顾

三峡地区历史时期是指从秦灭六国以后帝国形成至宋元明清时期,也就是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911年。这一时期正是三峡地区文化与经济的繁荣时期,经考古调查、发掘出土的考古遗存众多,为研究三峡地区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纵观三峡地区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发展轨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1949年以前

三峡地区历史时期考古学发端于19世纪70—80年代,主要参与者是外国的探险家、传教士和考古学家。1877年,巴伯(E. Colbore Baber)在重庆附近发现空石棺一具,发现石器一件^①。1932年,美国人罗伦斯顿(Lorensten)在万县发现汉代砖室墓一座,出土铜剑一柄,灰陶器以及五铢钱若干^②。而中国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则从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加入^③,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一些大学、科研机构陆续迁入川渝,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三峡地区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和研究才逐渐增多。1938年,美籍学者、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在曾家岩求精中学进行勘察发掘,清理出汉墓4座。葛维汉对发掘过程作了详细的文字记录,并辅以绘图、照相^④。同年,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在附设农场区内发现两具画像石棺,随葬的1件铜镜上带有“元兴元年五月壬午”的铭文^⑤。1940—1942年,卫聚贤、郭沫若、常任侠等又陆续清理了一批汉代砖室墓,中央大学史学系也在这一时期对沙坪坝嘉陵江畔九石岗的6座崖墓进行了发掘^⑥。这一时期,对于秦汉墓葬研究的学者并不多,主要有当时身处西南地区的金毓猷、卫聚贤、郭沫若、马衡、常任侠等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的主要内容涉及墓葬年代的判断^⑦、画像砖性质的讨论^⑧、墓葬的分类以及崖墓

① 转引自郑德坤:《四川汉代砖墓之调查》,《旅行杂志》第18卷8期(1944年)。

② 郑德坤:《四川汉代砖墓之调查》,《旅行杂志》第18卷8期(1944年)。

③ 转引自郑德坤:《四川汉代砖墓之调查》,《旅行杂志》第18卷8期(1944年);郑德坤:《四川汉代砖墓之调查》,《旅行杂志》第18卷8期(1944年)。

④ David Crockett Graham, "Excavation of A Han Dynasty Tomb at Chungking",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1938年第5期。

⑤ 金静庵:《沙坪坝发现古墓纪事》,《说文月刊》第1卷(合订本,1940年)。

⑥ 《重庆江北汉墓之发掘》,《图书季刊》新2卷3期(1940年);郭沫若:《关于发现汉墓的经过》,《说文月刊》第3卷4期(1941年);卫大法师:《重庆的汉墓》,《旅行杂志》第19卷1期(1945年);常任侠:《重庆附近之汉代三种墓葬》,《说文月刊》第3卷4期(1941年)。

⑦ 郑德坤:《四川汉代砖墓之调查》,《旅行杂志》第18卷8期(1944年)。

⑧ 常任侠:《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说文月刊》第1卷(合订本,1940年);黎凤翔:《重庆发掘汉墓之检讨》,《学海》第19卷20期(1942年)。

和砖室墓的综合研究^①。这一阶段的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获取材料的方式逐步由简单、零星的收集转变为有计划的勘察和科学的发掘,发掘墓葬时专门请测绘专家进行测绘,发掘后绘制墓葬平面图,并标明随葬品出土位置,随葬器物都配以线图、照相记录和文字记录,此时期的考古发掘摆脱了“挖宝”式的发掘。研究对象以秦汉时期的砖室墓、崖墓及其随葬品为主,主要是对墓葬、随葬品的年代、类型、性质进行研讨^②。

二、1949年至1990年

1949年至1990年期间,三峡地区历史时期考古工作得到很大发展。在田野工作方面,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仍然集中在墓葬方面。秦汉墓葬的发掘大为增多。1950年初,西南军政委员会为加强西南地区文物保护事业,在重庆市成立了西南博物院筹备处,该机构配合城区基本建设组织了不少抢救性考古工作。1954年,西南博物院在巴县冬笋坝发掘了20座战国至汉代的船棺墓。1957—1958年,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组织考古调查队,对三峡地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野外考古调查,发现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数百处,其中包括大量的秦汉时期墓葬,并发掘了十几处汉代墓葬和悬棺葬^③。经过60年代近十年的沉寂,1970年至2000年,三峡考古又迎来了一次小小的高潮。湖北省博物馆和宜昌市博物馆在宜昌前坪、后坪先后进行了5次大规模发掘,清理墓葬100余座^④,巴东墓地也发现了一批汉墓,部分墓葬还带有纪年^⑤。在重庆南岸区、涪陵

① 常任侠:《重庆附近之汉代三种墓葬》,《说文月刊》第3卷4期(1941年);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1946年。

② 常任侠:《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说文月刊》第1卷(合订本,1940年);黎凤翔:《重庆发掘汉墓之检讨》,《学海》第19卷20期(1942年);常任侠:《重庆附近之汉代三种墓葬》,《说文月刊》第3卷4期(1941年);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1946年。

③ 西南博物院筹备处:《西南博物院三年来清理重庆市郊古墓经过》,《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西南博物院秘书处:《西南博物院筹备处清理重庆江北相国寺汉墓》,《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7期;沈仲常:《重庆江北相国寺的东汉砖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3期;石正:《四川万县市发现的汉墓》,《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胡人朝:《重庆市化龙桥东汉砖墓的清理》,《考古通讯》1958年第3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长江三峡水库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第8期;陈培绪:《夔峡中发现悬棺葬》,《文物》1959年第5期;童恩正:《记瞿塘峡盔甲洞中发现的巴人文物》,《考古》1962年第5期。

④ 国家文物局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湖北工作站:《三峡考古之发现》,武汉: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

⑤ 鄂西自治州博物馆:《巴东西溪口古墓群发掘简况》,《三峡考古之发现》,科学技术出版社;张明达:《巴东县发现东汉纪年墓》,《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区等地也发现了大量的汉代土坑墓、砖室墓和崖墓^①以及少量悬棺^②。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研究领域较之前有所拓展,除继续关注秦汉墓葬外,六朝墓葬的研究亦引起学界的重视。即便是对秦汉墓葬的研究,研究视野亦从早期的墓葬年代、性质、随葬品的意义内涵,逐步转向对某一类型墓葬的综合研究。总体而言,本阶段考古工作虽仍比较零星,但全面的系统的田野工作逐步开展,发掘出土的考古遗存数量、种类明显增多。在研究取向方面,强调探讨文化遗存背后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播等问题。

三、1990年至今

1990年以后,特别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建三峡工程后,三峡考古工作迎来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1994年,为配合三峡工程及移民搬迁,根据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的统一部署,国家文物局指定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分别承担库区地下与地面文物保护规划的制定工作,成立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并相继设立湖北、四川工作站和重庆联络站。与此同时,来自全国30余家文物考古研究所、古建保护研究所、人类学等专业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的500多名专业人员,进入三峡库区并展开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复查和发掘,发现和记录文物点1282处^③。经过18年(1992—2010年)的考古发掘,三峡地区历史时期考古获得了许多重要收获,发掘秦汉以来的市镇和聚落遗址22处,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汉“朐忍城”所在的云阳旧县坪遗址、唐代市镇明月坝遗址等。发现了一批手工业考古遗存,如冶铁、冶锌、冶铜、制盐等。墓葬发掘亦取得重大突破,大量秦汉、六朝、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墓葬被发现,其中秦汉墓葬有480余座,六朝时期墓葬约有550座,唐宋时期的墓葬约有390座,元明时期墓葬约有230座^④。本阶段考古发掘尤其是墓葬的发掘,比较注重在充分调查和测绘的基础上,对一个墓地进行全面揭露,提取的信息更为全面丰富。石刻、古建筑等遗迹亦得到重视,调查、记录、搬迁保护工作逐一开展。

相比前两个阶段,这一时期考古研究范围大为拓展。关于城址和早期市镇方面的研究,除了对个别市镇的梳理外,也有对三峡地区市镇的综合研究。墓葬方面,除了年代、性

① 王新南:《重庆市水泥厂东汉崖墓》,《三峡考古之发现》,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龚廷万、庄燕和:《重庆南岸区的两座西汉土坑墓》,《文物》1982年第7期;重庆市博物馆、涪陵县文化馆:《涪陵易家坝西汉墓发掘简报》,《三峡考古之发现》,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468—473页;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涪陵地区文化局:《四川涪陵三堆子东汉墓》,《三峡考古之发现》,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498—502页;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涪陵县文化馆:《四川涪陵西汉土坑墓发掘简报》,《三峡考古之发现》,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444—450页;涪陵县文化馆:《四川省涪陵县白涛区小田溪发现春秋战国时期巴人墓葬》,《文物》1973年第1期;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临江支路西汉墓》,《考古》1986年第3期。

②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奉节县风箱峡崖棺葬》,《三峡考古之发现》,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465—467页。

③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④ 笔者根据2013年12月为止公开发表的考古报告、简报所作的统计得到的数据。

质的判定外,类型学、分期、文化因素分析,以及某一时段墓葬的综合研究,都有成果问世。从整体上看,三峡地区历史时期墓葬的研究已经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考古出土陶瓷器、铜镜、漆木器、金银器、农具等类型及其内涵、渊源、器物之间的关系、宗教等问题,也都有学者涉及。建筑布局、环境与建筑关系、石刻等,也有专文进行探讨。冶金、制盐等方面的研究,更多是从科技考古的角度出发,讨论其原理、复原其冶炼过程等。通过这些工作,三峡地区秦汉至宋元明清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逐步建立,遗址、墓葬、古建、石刻等方面的研究,都朝着多元化、综合性的方向发展,更为注重考古学的研究要透物见人,探索考古遗存背后的社会背景、思想观念以及文化传播等,既有个案研究,又有宏观的思考。

第二章 城镇遗址之发现与研究

三峡地区历史时期城镇与聚落遗址的发现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正式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的汉晋六朝时期遗址数量不多,其中重要的有重庆云阳旧县坪汉晋“胸忍”县城址、巫山古城遗址和湖北巴东旧县坪汉六朝遗址,以及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忠县中坝遗址等。隋唐五代时期,三峡地区城镇与聚落遗址无论从数量、规模,还是从其所反映出的文化内涵看,都较汉晋六朝更加丰富。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重庆市主城区发现唐代遗址2处,涪陵区发现唐代遗址4处,丰都县发现唐宋遗址11处,忠县发现唐代遗址8处,万州区发现唐宋遗址63处,云阳县发现唐宋遗址11处,奉节县发现唐代遗址有11处,巫山县发现唐宋遗址4处,湖北秭归和巴东县大约有23处^①。宋元明时期,经考古发掘的遗址数量,较前期有所减少,其中重要的遗址有湖北巴东旧县坪,重庆巫山大昌古城、渝中区老鼓楼、合川钓鱼城、奉节白帝城等。

第一节 汉晋六朝时期城镇遗址

西汉时期,三峡地区见于文献记载的郡级城市只有巴郡,巴郡的郡治设在江州县,即今天的重庆市。县级城镇有江州(今重庆市)、枳(今重庆涪陵)、涪陵(今重庆彭水)、胸忍(今重庆云阳)、鱼复(今重庆奉节)、巫(今重庆巫山)、秭归(今湖北秭归)、夷陵(今湖北宜昌)、临江(今重庆忠县)等^②。东汉时期,见诸史籍文献的郡县数量均明显增加,郡级城市有巴郡、涪陵郡、巴东郡、宜都郡和南郡五个,县级城市有江州、胸忍、鱼复、涪陵、平都、永宁、枳、巫、北井、秭归、夷陵、汉丰、丹兴、汉法、羊渠、临江等16县^③。其中,南郡是吴国于三国末年为抗晋新筑^④。两晋南北朝时期,三峡地区城市的规模与东汉基本相当,郡级城市中新建平郡,县级城市总体未变。但是,城市的名称屡有更改,“由于军事需要,原来城市加置的郡、州名越来越多。如梁于今巴东县城置归乡县及信陵郡、北周于南浦县置安

① 李映福:《三峡地区早期市镇考古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第27、28页。

② 贺世伟:《汉六朝时期三峡地区的聚落及相关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1页。

③ 贺世伟:《汉六朝时期三峡地区的聚落及相关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1页。

④ 陈可畏主编:《长江三峡地区历史地理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1页。

乡郡等”^①。

较之文献记载,经正式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的汉晋六朝时期遗址数量较少,其中重要的有云阳旧县坪汉晋“胸忍”县城址,巫山古城遗址和巴东旧县坪汉六朝遗址,以及云阳李家坝遗址、忠县中坝遗址等。云阳旧县坪遗址历经7年(1999—2005年)的持续考古发掘,对遗址进行了全面揭露,是三峡库区迄今为止唯一完整揭露的汉晋时期地方城址。根据所获科学且详实的考古学资料,并查证史籍文献之记载,最终确认为汉晋六朝时期的“胸忍”县城所在地。

一、云阳旧县坪“胸忍”县城遗址

旧县坪遗址位于重庆市云阳县以西约十五公里的双江镇建民村,是三峡地区一处规模较大的遗址。遗址坐落于长江北岸的一级台地上,北靠山崖,南临长江。遗址平面东北宽、西南窄,长江从遗址西南至东北环流东去。遗址的东、西、中部各有一条小溪穿过,自然条件优越^②。1994年、1998年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对遗址进行过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从1999年开始至2005年,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发掘,累计发掘面积约21000平方米,发现战国至唐代各类遗迹300余处,出土文物约4000件,其中,2004年发掘出土的汉胸忍令景云碑是胸忍县故址得以确认的关键信息之一。

1. “胸忍”县城遗址的考古发掘

1994年,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对该遗址进行了初步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小规模的试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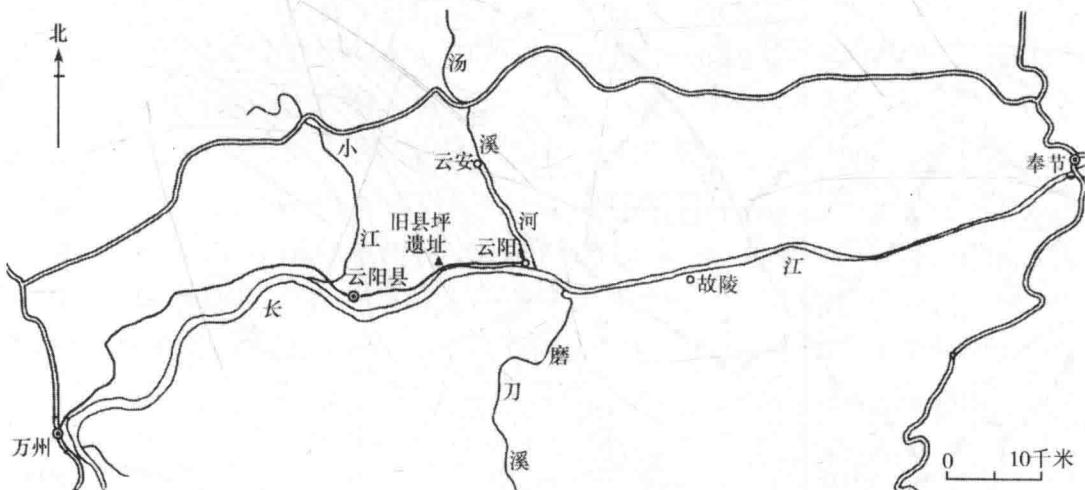


图2-1-1 旧县坪遗址位置图[采自《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第647页,图一]

① 陈可畏主编:《长江三峡地区历史地理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2页。

②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阳旧县坪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47页。

取得了比较丰富的考古学资料,为日后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奠定基础。继之,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8年对该遗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发现东周至宋元时期的文化遗存,以汉六朝遗存最为丰富。其中东周文化遗存主要有灰坑和陶器;两汉的遗物、遗迹发现较多,遗迹有12个灰坑、4条灰沟,遗物有建筑构件、陶器、铜器、铁器、玉石器和骨器等,其中建筑构件出土数量多、种类丰富,计有瓦当、板瓦、筒瓦和砖等;六朝遗迹共发现13个灰坑、2条灰沟,一座平面呈方形的地面式房址,房内东北部石块堆积较多,大致呈一条直线,发掘者推测可能为房屋的墙基,此外房内还有大量的红烧土,六朝遗物主要有陶器、瓷器、铜器、铁器和玉石器等;宋元及以后的文化遗存主要有6个灰坑、土灰沟、石灰沟和墙基等^①。

1999年起,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负责对遗址的发掘工作,并一直持续到2005年项目结束。连续七年科学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汉六朝时期的地方城址。

1999年对遗址进行调查、钻探、试掘工作,将遗址划分为A、B、C、D、E、S 6个发掘区,明确汉六朝时期的文化堆积主要位于台地东边的旧县坪、西边的指路碑大田和中部长坪等处,并在C区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铸范、炉壁、鼓风管和保温砖等与铸造相关的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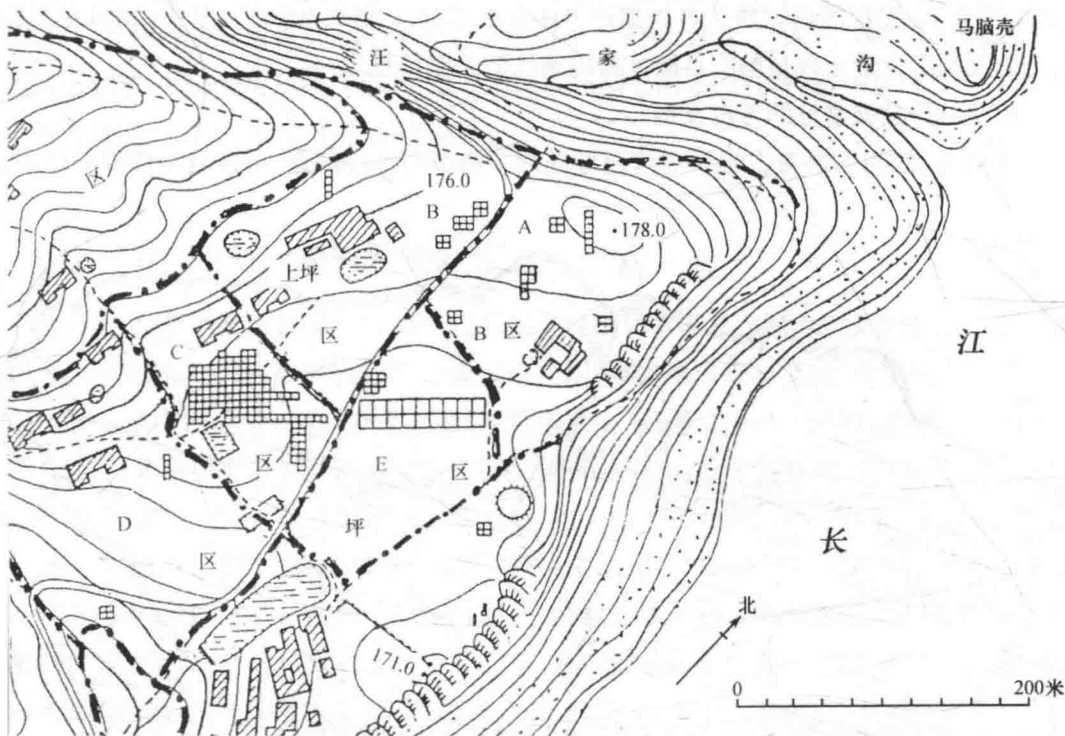


图2-1-2 旧县坪遗址2000年发掘总平面图[采自《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第648页,图二]

^①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阳旧县坪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